

乐山文史资料

本书编辑委员会

第二十一辑

主任

林 蓉

副主任

石化金

编 委

谢晓新

高 勇

张 康

余伯琦

刁耀承

丁 敏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林 蓉
副主任	石化金
	谢联新
编 委	翁 果
	张 露
	余伯玲
	刁继承
	丁乐生

本 部 委 会

林 一 青	主 任
王 升 金	主 任
周 耀 强	
熊 德 果	委 员
梁 光 耀	
余 余 余	
区 区 区	
丁 丁 丁	

目 录

乐山教育事业情况的回忆	杜峻森 (1)
马边教育事业梗概	刘华贵 (9)
忆武大附中——私立乐加中学	王文体 (14)
四川省乐山市第六中学校志序	杜道生 (17)
国家文物专家考察乐山历史文化名城略记	唐长寿 (20)
五通桥的龙舟赛	文 史 (23)
名人戏缘	陈果卿 (29)
乐山曲艺话今昔	田家乐 (33)
文化轶事二则	陈果卿 (41)
中日友谊学校修建记略	石正文 (48)
沫若中学与市川学园缔结友好学校记事	朱建华 (51)
乐山市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赫维湾市建立友好城市 关系的经过	张中梁 (55)
政协文化补习学校记略	宋 刚 (61)
优化教育资源 提高办学效益	邱令甫 (64)
乐山市新桥中学创重纪实	程永洪 (69)
记新兴综合性高级中学——峨眉三中	谢光弟 (75)

峨边中学五年建设发展回眸·····	吴映雪 (83)
村小教学二、三事 ·····	邹卫国 (87)
翰墨飘香铸真情·····	郑剑英 (91)
昆仑影业公司创始人	
——乐山老乡任宗德·····	杨乐生 郗 晋 (96)
字族文识字的实验与研究 ·····	鄢文俊 (105)

(1)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3)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4)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7)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8)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10)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11)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12)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13)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14)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15)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16)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17)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18)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19)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20)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1)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2)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23)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24)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5)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6)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27)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28)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29)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30)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31)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32)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33)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34)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35)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36)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37)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38)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39)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40)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41)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42)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43)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44)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45)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46)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47)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48)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49)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0)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51)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52)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3)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4)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55)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56)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7)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58)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59)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60)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1)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2)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63)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64)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5)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6)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67)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68)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69)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70)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71)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72)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73)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74)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75)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76)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77)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78)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79)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80)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81)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82)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83)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84)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85)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86)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87)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88)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89)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0)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91)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92)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3)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4)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95)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96)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7) 峨边县	峨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98) 普安县	普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99) 沐川县	沐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100) 马边县	马边县志编纂委员会

乐山教育事业情况回忆

(1904 年 ~ 1949 年)

杜峻森

清末时期的教育经历了从封建科举制度到开办新学的过程。

开科取士：清朝政府在文化教育上采用的封建科举制度，用开科取士来拢络封建贵族和士大夫中的知识分子，以达到收揽人心、维系封建统治的目的。所谓培养人才，亦即是培养奴才。多少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旦身入龙门，便可光宗耀祖做官管民。但不少人也因屡试不中落寞一生贫困以终。

那时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先县考，次府考，以后由北京派来“提学”再考，称为院考。院考取上了的就是“秀才”，考上秀才便取得了初步的“功名”，还可以继续上考，或进“专馆”和“私塾”教书，专馆即是一家或由几家聘请一个教师来教子弟，私塾即私人举办的学堂，这些学生出去参加考试，便称之为“童生”。

当时乐山设有一个“东岩书院”，是属于县办的，嘉定府有一个“九峰书院”，是属于府办。这两个书院，只有童生才能进去读书。童生去考，每次总有六、七百人。在成都有一个“尊经书院”，是属省办。三个书院都设有院长，斋务长等“三长”。记得当时尊经书院的院长名叫伍松生（翰林出身）。他的门前有副对联，上联

是：“天下翰林皆后辈；下联是：蜀中佳士半门生”。要具有“秀才”、“廪生”、“付榜”、“贡生”资格的人，才能去读那个“尊经书院”。

三年一次的开科取士，要逢子、卯、午、酉年才能举行。现在的乐山公园内，就是那时的“考棚”。嘉定府所属七县（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荣县、威远）的考生，都要来乐山参加考试。每县取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定的。考取了秀才，如果要继续上考，下半年可到成都参加“乡试”。乡试由四川总督和北京派来的大主考主持。考取了的就称“举人”。第二年便可以去京城参加“会试”。会试要丑、辰、未、戌年才能举行，考取了的就称“进士”，然后再参加“殿试”，又叫“对策”，就是几十名考生在金殿由皇帝圈定。考在前三名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做“探花”，到第十五名统称“翰林”。

清代的读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都是经（诗），论（语），或“八股文”，“策论”之类的东西。我个人当时在上私学，没有学八股，只读过《古文观止》。封建社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科取士，由童生考秀才，再考举人、翰林，然后做官，这便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唯一希望，也是仕途的阶梯，有的为之奋斗终生。真正能够读得起书而又能赴县、省，乃至京城上考的，除了贵族和士大夫以及官商子弟而外，所谓“茅屋出公卿”的又有几人？不能上考飞黄腾达的，有的就设馆教书，或借诗饮酒以愤世，下焉者求此尚不可得。那时乐山就有陈耀廷、黄沪裳、彭子林、刘达三等几位科场的落榜书生，穷愁潦倒，半生不遂。

废科举办学堂：由大兴科举到废止科举，开办新学，这在清末算是颇堪玩味的一段历史。由于当时朝廷腐败无能，以致内外交困，所谓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已因列强入侵而门户洞开，变法维新又告失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影响。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办学堂。当时乐山只有两个书院,择选成绩优异的调去读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草堂寺的庙子拆掉正式开办了一所“乐山县官立小学堂”(内有寝室、教室、自习室、操场)。在那之前,我还在读私学,同年就考进县小。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只录取了八十人。考生中有大至二、三十岁的,我那时才十四岁,名字叫杜高崇,同我大哥杜高炯一起考上。那时郭沫若的学名叫郭开贞,也同时一起考上县小。第二年进学校分为两个班,一班是甲班,一班是中学预备班。把年龄大些的成绩好的分去读预备班,郭沫若因成绩很好,就分去读了预备班。

当时小学中的教师有:教语文的是陈济民,教经学、图画、音乐的是帅平均,教历史、地理的是刘书林,教数学的是杜少裳,教植物的是王祚堂,教体育的是黄云章。

在乐山县官立小学堂开办之后不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嘉定府也办起了一所“嘉定中学”。我有机会考上中学,又有缘和郭沫若成为中学的同班同学。那是因为嘉定府考中学时,中学预备班只有三十几人,当时大县要取四十名,中县取三十名,小县取二十名,乐山是大县,不够考额,所以把县小甲班中成绩好的,一齐送去参加考试,这样我才考上了中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我进读嘉定府中学,分甲一、甲二、甲三、甲四四个班。那时中学校址,就设在以前原有的“考棚”内(现在的乐山公园)。有教室、寝室、自习室等,又将考棚二、三堂加以培修,在侧边还增修了一个楼,称为“洋楼”,是准备聘请外国教师来住的。学校规定五年毕业,课程有:国文、经学、历史、地理、算术、日语、体育、图画、音乐等。记得当时教经学是谢碧成,教历史是刘星南,教地理是詹桂村,教算术是个峨眉人(名字记不清了),教英语是杨少奇,教日语是魏文通,体育教师没有聘请。

我进学校五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可在五年中就换

了五个校长。最初是王晋芙,其次是秦丕基、严道尊、王怀宣、傅乐之,那时只有一个中学,每年招一班,我读的是甲班。以后称乙、丙、丁、戊、己、庚班,继后改成一、二、三、四、五、六、七班。郭沫若后来提前离校,到成都去考高等学堂,即由当时“尊经学院”改建的。岁月流逝,恍如昨日。缅怀往昔,倍增怀念。郭老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在文化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他的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国界,誉满全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我于1911年也到成都读四川高等学堂,1914年(民3年)毕业后转回乐山母校,从六班起开始任教。

民国元年裁府留县,将原来的中学改成“嘉定联合县立中学校”。之后,政局动荡教育经费至感困难,联中那时的校款更是来之不易,系由中资捐助(房地产买卖的中人费)勉强解决。每百元抽一元,由“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所长(称视学)承办。七县共组织一个“维持会”,由乐山县长兼任会长,学校校长为副会长,七县“视学”为委员。每年暑假由校长召集各委员开一次“维持会”,审查学校的预决算。大县负担六成,中县负担五成,小县负担四成。当时教师的来源,一方面由校长聘请,另一方面由视学介绍。各县送款也要介绍教师。因此,虽有“维持会”之设置,也不免有维持不了的时候。

学校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办,到1934年(民23年),这二十七年之中,就改换了二十一个校长。校长的任期多则两年,一般只任一年或半年就换了。校长由省上委任,教师由校长聘请,只聘一期,第二期是否继任,谁也不知道,粉笔生涯最无保障。校长和教师,都要到开学时得到了委托或聘书,才能放心,反复循环年年如此。民国时期在教育界盛传的六、腊之颤,既是讽刺也包含不尽的辛酸。

1930年(民19年)嘉定联合中学,又改名为嘉属联立中学。为什么要改?因为中资学款由四川省府完全提走,重新统一分配,所以改称联立中学。至1940年(民29年)才改为四川省立乐山中学,校款由省拨给。校长并不一定是嘉属的人,外处的人也可以当校长(陈仆安,张亮清曾当过校长)。教师就更不一定是嘉定的人了。从联中开办到1937年(民26年)还从来没有一个女教师,足见当时风气的闭塞,对妇女的偏见。

1924年(民13年)乐山进行学制改革,嘉属联中,分初、高两级,原来是四年毕业,从二十三班起,改成初中三年毕业。当时四川军阀,占山为王,各划势力范围,驻防乐山的为第八师师长陈洪范,他的师部原驻九峰书院,为了要扩大范围,借口说联中在城里不适当,应迁到城外去。经校长杨南平多方说情,才由陈洪范答应在肉税项下拨款三万元,作为重修校舍,1925年(民14年)学校便迁到徐家壩去。

为了改革学制,省教育厅召集各中学校长到成都开会,要联中办高中,各县办初中。因此联中于1927年(民16年)停办初中只办高中,高中办文科一、二班。师范班改称高中,设普一班、普二班。

由于学制的改革,乐山才有县男中,县女中的成立。1926年(民15年),省教育厅长万克明召集全川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开会,我当时是教育局长也参加了会议。要联中只办高中不办初中。但小学毕业人数太多,他们去哪里升学呢?当时犍为、荣县、威远都办了县立初级中学,我乘开会之便,建议回去同峨眉、洪雅、夹江三县局长联合筹办(四县联办),这样经费才好解决。我回来以后又提出单独办的好,主张成立一个董事会,组织地方绅士开会,创办一个县立中学,校址设在桂华寺。经费问题,召集各乡、团和绅士开会解决,在粮税内附加。1927年(民16年),就这样成立了县男中,但没有公立女子学校,仅有基督教会办有一所进德女子小

学。当时龚旭东老先生极力主张开办女子学校,经过筹备,又随即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校址在现在的鼓楼街)。从此,女子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女生逐渐增多,小学毕业后,家庭有钱的学生就到成都去升学,没钱的就只有失学。不少人来找我说:男子读书有中学,女子升学就无人管。我认为应该解决,但经费又无着落。1928年(民17年)5月我正准备交教育局长职务,才把此种情况向继任局长杜镜如作了交待。此后承乐山在成都的“同乡会”人士热情来信建议:办学校的经费和地点,可以把“教养工厂”停办(无业游民学工艺的地方,即当时“总爷衙门”,就在现在的县街小学),将其经费和地址拿来办女中。筹办三班需要八千元,又在粮税上附加五角,共计一元五角,县男中分一元,女中得五角。在成都立案之后,1929年(民18年)乐山女中便正式成立了。每年招学生一班(郭肃华就是那时女中的第一班学生),女中校长由男中校长帅蕴德兼任。那时教师的待遇,没有省乐中的好,但每月都能按时拿到薪水。所以好多教师都愿当县男中、女中的教师,而不愿当联中的教师。1932年(民21年)我任县男中校长,陈学熙任教务长,王泽霖任训育主任兼化学教师,袁仲权任监学,杜绍儒任生物教师,戴俊清任数学教师,杜履中任历史教师,胡养卿任地理教师,郭宗缙任音乐、图画教师,尹道任任体操教师,雷天声任童军教师,改为每期招生一班。

1936年(民25年)我当女中校长时,又增加一班。到1939年(民28年)春季,县男、女中学各招一班,但每班只收五十人,没有考上的人太多。当时“私塾”很少,“专馆”老师也没有。许多家长要求解决子女入学。要增加班次,学校经费有限,但又不能不想办法;于是找老师们共同商量另办一所私立中学。当时我同郭宗缙、龚啸风、陈守一、戴尚文、雷家煦、戴文均、杜道生、吕亢中、章定生等十人出面,邀请地方士绅在草堂寺开会,筹商开办私立中学问

题,大家都很赞成。由王德斋定名为“凌云中学”,男、女生各招一班。由于经费地址都有困难,只好采取临时措施,把男生部附设在草堂寺,由龚啸风兼男生部主任(龚啸风那时原任草堂小学校长),女生部附设在女中,因我是女中校长不能兼任女生部主任,改由陈明玖担任。可是立案必须要有基金,否则,省教育厅不能立案。后来有人提出乐山“炎帝会”有房地产。1933年(民22年),地方军阀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要变卖乐山官公营庙产,也包括炎帝会庙产在内。地方人士要求保留一部分作为学校基金。经由杜少裳去找刘文辉说(杜曾任二十一、二十四军的机要秘书),刘答应了。这样凌中就以部分炎帝会庙产收入作为基金,省教育厅才准立了案。不足的经费和其他设备,发动地方人士募捐,有的捐一百元(银元),有的出二百元。开始招第一班,以后每期招一班。1939年(民28年)4月正式开学。下半年乐山遭日机轰炸,县男、女中学,均迁至乡下。县男中迁至牟子场,县女中迁至苏稽。凌中要找适当的地点,很费了一些周折。经龚啸风建议决定迁到水口,男生部住谢祠堂,女生部住任祠堂,我们都到水口去教书。1941年(民30年)下半年已招到四班,但校址容纳不下,我提出迁回乐山,大家也很同意,凌中迁回原县男中校址老“关帝庙”,住男生,“张爷庙”住女生,共招十二班,男女各六班。

1942年(民31年)我当凌云中学校长时,章定生任教务主任,王克昌、郭宗缙任训育主任,陈良伯、帅平均任语文教师,陈学熙任历史教师,帅炳常教“公民”,我和戴文钧任数学教师,邹泽安任物理教师。我作了两年校长就交了,以后凌中由初中办到高中,是由龚啸风接手经办的。由于每年投考凌中的人多,每班达七十多人,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很不少,一直办到解放前夕。当时学校的董事长是徐光普(徐为前川军二十四军师长、国民党乐山县参议长)。1940年(民29年),牛华溪成立震华中学,公信堂(天主教会)也

成立一个“德声中学”。1942年(民31年)县男中要从乡下迁回城里,凌中又先占用了他们的地址,他们便在“文昌宫”山下新修一座房子。但是男中有六班学生,房子仍不够用,因而又迁到“文庙”里。此后男中就一直在文庙,在文昌宫校舍又办一所简易师范。

抗战开始后,华北和东南各省许多文化教育机关都陆续内迁,武汉大学也于1937年(民26年)西迁乐山。由于武大教职员子女甚多,兼之外地迁来的其他单位也不少,乐山人口骤然猛增。本县原有各学校无法收读这样多的学生,经有关方面协商,才由武汉大学自办了一所“武大附中”。1945年(民34年)抗战胜利,武大要迁回武昌,附中学生本地人数甚多,附中又不能随迁。当时附中校长蒋思道也要走。他就召集武大乐山籍毕业学生唐叔庆、欧阳达、吴正和、杜厚寿、徐平江商量准备把学校的财产交地方。他们来找我谈,我自然很赞成,我说还是同凌中一样,找地方绅士帮忙,为地方增办一所学校是件好事,应当继续办下去,遂邀请地方人士开会同意,改成“乐加中学”。私立学校要有“董事会”,才请杜履谦出任董事长(杜本人在当时的西康省政府任职),校长是帅蕴德,副校长是唐叔庆,高中部男女生往高西门李公祠(现在市医院宿舍),初中部在铜河埭“王爷庙”。读通学的学生较多,大都是本城人,学校里留三位常住董事(游子久、吴正和、杜高崇),由于杜履谦长住雅安,董事长一职由我代理。就这样乐加中学一直办到1949年,解放后才改为第四中学。由高西门迁到岷江东岸前“中央技专”地址。

乐山教育事业的开办和发展,由清末的科举取士到民国时期的兴办学堂,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由小学到初中、高中,由一所至多所,几经曲折,历尽艰辛,总算稍具规模,为桑梓地方培养了一些有用的人才。

马边教育事业发展梗概

刘华贵

马边早在汉朝就有汉族散居,但文化广泛传播,学校普遍设立却在明代。

明万历前,马边的文化教育仅限于豪门望族,巨贾富商、殷实之家,延聘师资于家教习子女。万历 17 年(1589)平定三雄后建安边厅。汪京任同知,深感设学之需,于城内建学宫并置学田两百余亩,广泛宣扬设馆教学之必要,“马边于是乎有学”。自此,厅内农、工、商、贾,普遍设馆延伸,此乃马边教育之始源。

清中叶,马边私塾鼎盛。乾隆 2 年(1737)扩建学宫;乾隆 45 年(1780)通判魏廷颢再扩学宫,建棂星门,提学刘锡段题准裁拨屏山学额增生 4 名,廪生 4 名归马边,4 年 1 贡,12 年选拔 1 人;乾隆 46 年(1781)设儒学署;50 年(1785)扩学宫、修戟门;56 年(1791)筑泮池。嘉庆 17 年(1812)建书院。咸丰时设考棚。同治时建书院于小东街。光绪 31 年(1905)废科举创新学。马边私塾共培育进士 2 人,贡生 18 人,举人 6 人,秀才 23 才。

光绪 31 年(1905)清廷下诏行新学。马边改“儒学署”为“学务局”,裁撤训导,设“学堂总董”。翌年,马边城内创办“开成”、

“振武”两所小学堂和一所高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招收具有“四书”、“五经”基础的私塾生就读),马边新学至此肇始。

为解决新学师资困难,“当局令各州县集资选士,赴日本学习师范速成科,以明教授之法”。光绪30年(1904)派秀才张涛斋赴日本弘文学院“四川速成师范校”学习;光绪33年(1907)政府通令改“学务局”为“劝学所”。时值赴日学生归国返县,在马边大力推广新学,发展汉族学校,且创办化彝小学一所。宣统元年(1909)省视学程昌祺来马边视察;宣统3年(1911)马边除高等小学1所外,初等小学发展到19所,共有学生625人。

民国初,战乱不息,匪势猖獗,民不遑生,送子攻读民众锐减,清末的20所小学仅存13所,学生由625人减少到229人。1915年(民4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公所”,冯斗山任教育科长;1925年(民14年)改马边“教育公所”为“教育局”,冯斗山继任局长,马边学校逐步恢复;1930年(民19年),高级小学发展到2所,初级小学15所,共有学生640人,教员46人;1931年(民20年)又创办恒德师范一所(一年后停);1933年(民22年)裁局改科,隶属县政府,改“视学”为“督学”。据1934年(民23年)“马边教育概况统计表”载:全局五个区学龄儿童数为17370人,实际入学儿童为1737人,入学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数的10%。

1935年(民24年),马边“建设”和“教育”两科合并为“第三科”,除大力发展普通小学外,还在全县推行短期义务教育。是年,马边小学发展为30所,76个班,学生1968人,教员58人;短期小学8所,19个班,学生693人,教员19人。翌年又新办高初两级小学5所。1937年(民26年)创办了省立马边边民小学(彝族小学)1所,招彝生17人,汉生89人。

1940年(民29年)实施新县制。“教育”与“建设”分科,复设“教育科”,实施国民教育,施行“三位一体”的领导。马边根据“县

政府各组织纲要”规定,改乡(镇)两级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改乡村小学为“保国民学校”,将短期义务小学分别并入中心国民学校或保国民学校,强令儿童入学。是年秋,马边创办了马边县立初级中学,由贺昌群任校长,招收新生 84 人。

1941 年(民 30 年),按马边县政府制定了《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全面推行“国民教育制度”。除新办了一批国民学校和一些学校增加班级外,并将省立边民小学交县管理,改为“马边县立边民小学”,将校址由永善乡(今建设乡)迁到城南之忠心寺,有 5 个班,在校学生 145 人。农历 10 月县立边民小学停办,11 月又根据“边民教育计划”在城内学宫(文庙)设立“边民生活指挥所”,招收彝族儿童 50 人入学受教。二年后停办,又在马边右营南宁场(今走马坪乡)和右营水碾坝各办了 1 所边民小学,共有学生 73 人(彝生仅 32 人),后改为保国民学校。

1941 年(民 30 年),马边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贺昌群辞职,李伏伽继任。根据马边民族地区的需要,学校增设彝文、农业课和会计课三科。五年后李伏伽因经费不敷,教师难聘,学生难招,五次呈文后辞职离校。此后县立初级中学四易校长,每况愈下。在当地政府和地方人士及校外同学的请求下,李伏伽返校重振校风至 1949 年。

1947 年(民 36 年),马边 8 乡 1 镇,86 个保,共有中心国民学校 10 所,保国民学校 48 年,边民小学 3 所,私立育强小学 1 所。这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马边学校最多的一年。此后,因兵荒马乱、匪患肆虐、社会动荡,学生人数日趋势减少,到解放前夕,全县仅有中学 1 所,小学 9 所,学生 600 余人。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马边办学 30 多年,所出人才寥寥无几。到解放时,全县 35931 人中,大学毕业 14 人,大学肄业 23 人;高中毕业 30 人,高中肄业 75 人;本地就读的初中毕业 295 人,初

中肄业 379 人;高小毕业 1327 人,高小肄业 1581 人;初小毕业 2078 人,初小肄业 2040 人;读私塾识字者 2039 人,不识字的 26031 人。1950 年马边成立人民政府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 1 所马边中学,8 所小学。经过 3 年的恢复和建设,1953 年全县有中学 1 所,学生 262 人;小学 72 所,学生 4729 人;民族小学 2 所,学生 74 人。中小学教职工 209 人。1955 年将沐川所管的荣丁等三乡一镇划归马边所辖,又增加小学 14 所。

1958 年,马边县委提出“全县文教工作大跃进的意见”大力发展公、民办学校。是年,马边县立初级中学开设了高中班,全县中学增加到 4 所,在校学生 1198 人;汉族小学发展到 90 所,学生 7155 人;民族小学由 1953 年的 2 所发展到 26 所,彝生增加到 2389 人。

1959 年,改“马边县立初级中学校”为“四川省马边中学校”。同时在城南忠心寺创办第二中学(实为初级师范学校),招生 30 人(大部分由外县招人)1 年后停办。

大跃进时期,中小学发展过快,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1960 年,在小学校中大量清退超龄生。1963 年精简合并了部分学校。1965 年开始大办“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中小学校。到 1966 年秋,马边各类中学 7 所,小学 152 所。在校中小学生达 9652 人,中小学教职工 420 人。

建国后 17 年的教育,马边小学共招新生 30610 人,毕业 9556 人,初中招生 2658 人,毕业 1198 人;高中招生 551 人,毕业 276 人。

十年“文革”期间,马边教育事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干代学”推行“朝农(朝阳农学院)经验”与“两办两挂”(大办工厂,大办农场,与厂挂钩,与社队挂钩)。中小学师生走出课堂,纷纷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部分中小学停办。县